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二一期 ——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8e)

【研究述评】	文革文物能反映一个真实的文革吗？	寒 山
【口述历史】	逍遥派说文革	高尔品
【难忘岁月】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三）	刘光耀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述评】

文革文物能反映一个真实的文革吗？

• 寒 山 •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文物市场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收藏品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收藏门类，吸引了众多的收藏者。在北京的潘家园和红桥，南京的夫子庙和苏州的文庙等文物交易市场上人们能看到形形色色的毛泽东纪念章，毛泽东塑像，毛泽东语录、毛泽东诗词，各种印刷品如文革小报、传单和海报以及文革邮票，还有书籍，例如文革时期出版的小说、连环画和样板戏剧本等等。

除了这些宣传品，还有很多带有文革标记的日常生活用品，例如闹钟、茶杯和甚至锅碗瓢盆等等。在这些用具上，今天人们能够知道在文革时期，即使在这些日常生活用具中人们也必须看到领袖像，念到领袖语录和革命口号。文革意识形态对中国人生活的渗透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文革物品被当作文物进入市场后，总体来说它们的价格不高，虽然趋势在上涨，个别的物件尤其是邮票能卖到令人吃惊的高价，例如一幅题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邮票可以买到一万两千元人民币。

只要对文革有起码了解的人都知道，文革物品首先是宣传品，而不是艺术品，尽管在创造

它们的过程中结合了一定的艺术形式，但在根本上它们和明清时代的瓷器和绘画、唐三彩或者兵马俑无法相比，基本上没有美学价值可言。那么，收藏它们主要就不是为了欣赏。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收藏这些根本无法给他们带来美好感受的物品呢？它们又在什么意义上能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文革，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对于那段历史的公共记忆中一个组成部分呢？美国圣玛丽学院的徐贲教授最近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

徐贲认为，文革物品之所以成为“文物”，并不是象其他文物那样因为时代久远，而首先是因为有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断代感，使得文革在感觉上似乎离我们很久远。这种断代感之所以是人为的，主要是和文革有关的人和事早就被故意排斥在后文革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词语之外，因此，谈起文革，人们在感觉上就好像是在谈很久远的过去，和现实毫无关系。

徐贲说，这反映了文革在当今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两重性：“文革的政治和社会讨论仍然是禁区，但文革物品却已纳入了官方认可的‘现代文物’交易。政治和市场被人为地在表面上割裂开来。”因此，可以说文革物品之所以成为文物，是和官方长期以来企图切断文革和今天中国之间的联系的种种努力分不开的。历史的讽刺性就在于：那些不希望人们牢记文革的人，倒是很希望看到文革被当作一个遥远的过去寄生在文物当中回到今天，这种回归只会加深文革和今天的中国风马牛不相及的错觉。

徐贲指出，和一般意义上的文物收藏不同，今天文革物品之所以成为文物，“与其说是因为这些物品本身的优良品质（令人赏心悦目，勾起美好回忆，给人知识教益，引发审美情趣等等），还不如说是因为商业的炒作。”几乎没有什么文革物品的价格反映了它所表现的人类文明结晶，因为它们绝大多数不但没有文明成分，反而是反文明的。但是它们之所以成为文物，又符合文物的一个基本特点：物以希为贵。毕竟，今天在普通人家家庭中轻易是看不到文革物品的。

徐贲告诉我们，这种稀少绝不表明文革物品本身的珍贵，而恰好相反，这是因为这些今天的所谓“文物”在文革结束后的那一段时间里都被当作“废品”大规模地处理和回收掉了。

在一般文物身上体现出来的“物以希为贵”多半是时间自然淘汰的结果，但文革物品不同，徐贲说：“文革藏品的稀少可以说是全社会集体丢弃的结果，它的价值与其说是因为时间的积淀，还比如说是因为侥幸未被丢弃。文革文物因稀少而应市，有它自己的前史。这前史就是，人们曾对文革有过强烈的厌恶。”正因为文革文物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在它们的收藏家中，似乎没有什么人可以说是出于对它们的喜欢和欣赏，这和收藏和购买古玩字画不同。收藏文革主要是为了牟利，强调的是某物品的“升值潜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文物收藏中，收藏者对某个物件艺术风格的个人喜好会在他作出购买决定时占很大比重，但这个因素在文革文物的收藏中可以说是十分微不足道。再有，收藏古董和字画，即使不出手，也可以有实用价值，例如作为家中的摆设，显示主人的地位和品味。但文革文物则完全不同，几乎没有人会用它们来装点家庭。

因此，从很多方面来看，文革文物收藏都不是人类对高尚优雅事物的追求，而是对那些在任何正常社会中都不可能登堂入室的物品的一种畸形心理。徐贲告诉我们，文革物品之所以能在半个世纪不到的时间里就成为“文物”，主要是因为官方刻意制造的文革历史和当代现实已经隔得很远的“断代感”，这种“断代感”加上“物以希为贵”的市场法则，使得很多人不顾文革物品美感和艺术品味的低劣，纷纷将它们列为自己的收藏对象。这就造成了文物收藏事业中罕见的大量粗制滥造的物品竟然在短短的时间里成为“文物”的怪现象。

然而，如果文革文物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其意义仅仅是一种“炒作”，并局限在文物市场的

范围内，那倒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但是徐贲告诉我们，在文革文物在大陆市场越来越热的背后，是一个将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正常化”，以及用“平常心”来看待文革，发掘文革中“日常生活”的倾向。而这对于整个民族对文革的历史记忆和善恶判断是极为有害的。

什么叫将文革生活“正常化”和用“平常心”来看待文革呢？什么又是文革中的“日常生活”呢？比如，一个人写一篇文章，讲他在文革中结婚时领导送给他和妻子一个瓷盘，上面刻有毛泽东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毛泽东的头像。作者告诉我们，这个瓷盘在当时是被视为很珍贵的东西，不但好看而且有用，它在那些年代里伴随著这对夫妇渡过了难忘的日子，以至于今天当看到它时情不自禁地会产生一种怀旧甚至温馨的感觉。这就叫用“平常心”来看文革，发掘文革历史中“平常人”的一面。我们不能说这个故事不真实，毕竟，文革中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并不都是完全政治化的，吃喝拉撒，开门七件事，爱情、亲情和友谊等等也还远远没有都被政治抹掉，也不可能被抹掉。但是，如果这个温馨的回亿不是纯粹个人的私下的诉说，而是通过文字甚至图像进入了公共空间，那就成为社会对文革生活的公共记忆的一部分。今天很多对文革物品的描绘，尤其是那些日常用品，常常伴随著这种将文革历史“日常生活化”的文字。

徐贲认为，在文革文物的收藏和介绍中，除了这种将文革时期的中国“正常化”的倾向，还有一种以第三者的态度去消费、欣赏或观察的现象。这就是说，把文革文物真正当作“文物”，讨论它们的“审美特征”、“艺术价值”和“民族文化特色”、以及“中国特色”等等，有的还讨论文革物品的“朴实无华”。在这种眼光下，文革物品完全失去了时代背景和特定用途，不但变成了一个超越时代的艺术创造物，和其他真正的文物相并列，而且在一些人那里还代表了美德。

将文革物品“日常生活化”也好，把文革物品当作艺术品以“第三者”的眼光来欣赏也罢，都是有意无意地加入了将文革物品“去政治化”、非历史化，将它们漂白，抹掉它们所代表的专制统治的印记，以表现“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为名掩盖文革对人性的扼杀。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文革的文物热恰恰是反文物的，因为人们从一般的文物鉴赏中寻找的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感，而在今天的大陆，将文革文物“日常生活化”却是要人们忘记产生这些物品的真实历史背景。

有一种论调说：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因为人们深受其害，所以对文革的批判和控诉是文革记忆的主流，但随著时间的流逝，对文革的记忆和描述将不再受这种将文革简单化的历史环境的束缚，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复杂多样性和文革生活中的非政治性就必然会受到人们的重视。这种自命客观和有“历史感”的论调实际上否定的正是文革有别于任何历史时期的一面：暴力、粗俗和丑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公然行之于世。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生活没有任何“复杂性”可言。

可以预言，如果官方不改变对文革的政策，在亲身经历了文革并对那段历史有深刻反思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的时候，上述这两种对文革的中立的从而毫无批判性的描述将在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徐贲说，以表现极端时代中的日常生活来掩盖这些时代的罪恶，在战后德国也出现过。在经过了纳粹历史长期不断的反思和批判后，七八十年代有很多德国人不愿再面对历史中的阴暗面，要求将过去“正常化”，出现了一些从“日常生活”角度表现纳粹德国的文字和图像作品，甚至纳粹的宣传品和符号——如制服、军旗等等——也被当作“审美对象”。面对这种倾向，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在公共意识中历史地对待纳粹时期”。

在今天的中国，“如何在公共意识中历史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比哈贝马斯当年在德国提出的那个问题更具有迫切性，因为德国不但完全彻底地否定过那段历史，而且今天的政治和社会环

境也还不允许对纳粹时代有任何公开的赞美。所以，要让文革在民族历史记忆中真正恢复它的本来面貌，在中国还是任重道远的。

□ 原载《新世纪新闻网》

~~~~~

## 【口述历史】

### 逍遥派说文革

• 高尔品 •

〔根据2004年10月一次“口述历史”采访录整理补充。〕

我知道，逍遥派在文革中，是最让雄纠纠的红卫兵和气昂昂的造反派们看不起的。但我不能撒谎，因为，我真地是做了整整十年的逍遥派，何况我的那些同窗和我一样，如今都还活得很是清醒。

#### 一、要想了解文革——得先了解十七年

文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共十七年持续强化专制极权统治的一个大恶果，是中共十七年不断内讧内斗的总爆发，是中共十七年对外对内一切倒行逆施的总表演。不了解、不研究十七年，就没有可能了解文革之所由来；不了解、不研究十七年，就同样不能了解中共文革之种种疯狂行径的历史成因。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述：文革，不过是使中共从一党专制复辟走向了毛氏君主专制复辟，使中共从坚持“马教”专制统治走向了坚持“毛教”专制统治，使中共从专制的等级森严走向了反动的血统至上，使中共的从残酷镇压走向了镇压的“无法无天”，使中共从架构权力经济走向了毁灭国民经济，使中共从公开否定民族历史文化走向公然毁灭民族历史文化……。

今天不谈理论，我还是从自身的命运说起。

我清楚地记得，1958年5月18日的夜晚，我的父亲和安徽省的一万八千多名知识份子一起被逮捕了。

第二天早晨，当我来到学校时，早读还没有开始，却发现班上有七、八个同学都哭丧着脸，聚在教室的后门口，一个个全低着头，也不说话，等我也站到他们身边时，才知道，他们的爸爸也被抓走了。判刑之后才知道，罪名都是“右派加历史反革命”，“判决书”都是法院统一油印的，上门只是填写了不同的名字而已。

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们被学校、老师和所谓出身好的同学，指骂为“小右派”，“小反革命份子”；如果我们去看守所、劳改农场或劳改工场去看了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回来就要被变相地批判和斗争，不是被叫起来罚站，就是罚我们打扫卫生。可以说，我们无时不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中。尤其是在1962年之后，那时，人们刚刚熬过了饿肚子的岁月，毛泽东又开始“大抓阶级斗争”了。虽然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被“保外就医”，但是，我们仍然属于“五类份子”的家属。父亲是要在街道上被监督劳动的，每天早上必须按时去扫大街。作为一个知识份子，他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被弄死，我那个教了一辈子书的舅舅就在劳改农场被活活地饿死了。我们还没有家破人亡，因为我的大哥大姐还能够寄钱回家，养活我们的父母，供我和我的小哥上学，我们才没有停学去拉板车、卖冰棒或捡垃圾，没有讨饭，没有从此陷入

要活不能、欲死不得的境地。所以，我们已经感到很满足。虽然恐惧的阴影从来不曾在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心头消失过。

我想着重说的是，其实，从1949年以后，恐怖就一直就深深地笼罩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身上，除了那些“骑在老百姓头上的解放者们”，再就是那些“自认为被解放了的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们”。中国共产党当时就有四千万党员。这些党员中的掌权者们，从中央到地方，到每一处农村，到每一所小学校、小商店——凡是中国领土所能达到的地方，都由他们统治，都由他们说了算。在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一个普通人，只要说了一个党员的“坏话”，或向一个党员提了意见，就会被打成右派份子，就会被劳教劳改，家破人亡。

而这个统治集团又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

一种是1949年前就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因打下了江山而掌握了政权的人，他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自上而下被“分封”为各级各行各业的大官和小官，人人都有了一块“领地”或“领域”。中共据此复辟了自秦汉起就已经被推倒的中国封建制度，建立了一个“洋教专制复辟政权”，确立了它的“马列党族分封制度”。

另外一种，则是靠分化人民所制造出来的。共产党把人民中的一部份，硬要说成是领导阶级的组成部份，他们当然只是一些虚假的统治者，比如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自然，在他们当中，还有其它社会成份中，确有一部分获得了提拔或重用，特别是每一场政治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们——他们当中确有人青云直上，从而入党做官被“加封”，从此“由贱而贵”。

这样，那些所谓成份好的——党的干部及其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及其子弟，还有所谓的积极份子，各式各样的先进人物们，他们便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而那些被共产党打倒的地主富农资本家，没有被处决的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及其家属和后代，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包括从来就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商贩、无业游民等等，就都成了被打击、被压迫和被改造的对象。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壁垒分明的社会。一小部分人在实际上统治着整个中国，另外一大部分被党统治的人，有的虽因戴着“高帽子”而跟党走得洋洋自得，饿着肚子也要天天高喊共产党万岁；有的却在恐怖之中一边被迫喊着共产党万岁，一边却在暗中痛苦地呻吟和挣扎。

这种状况，直到文革爆发，已经持续发展了整整十七年。十七年间，由于共产党特别地提倡阶级斗争，大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贫下中农对地主富农的斗争；不断地煽动所谓的人民群众，去斗争所谓的阶级敌人，去斗争所谓的剥削阶级和那些所谓出身不好的人——有“历史问题”的人，有“现行问题”的人；再加上毛泽东又一贯认为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是可以“制造”的，也就是根据他和共产党的需要，能够“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要紧就紧，要松就松，要多残酷就能够多残酷”；从而发动了十数次政治运动，以迫害、甚至是公然地和大批地屠杀他的阶级敌人们。所采用的方式，全部为文革所效法，只是不象文革那样完全公开化，扩大化，甚至扩大到了共产党各级官僚们自己的头上。十七年间，单单被毛泽东和共产党以各种方式予以迫害并置于死地的，就达六千万之数，比其后文革十年的枉死者，整整高出三倍以上。这就是1979年邓小平要以平凡冤假错案来“收拾人心”时，被平反者绝大多数都是文革前十七年的被冤屈者，或干脆是十七年中的冤魂。

似乎特别要加以说明的是，十七年间，自始至终，共产党都在通过一切形式的理论、文学和艺术，对全社会进行了长期的和从未间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从而不仅制造了全社会的思想恐怖，而且在实际上造成了人民对所谓旧国家、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地主

和资本家、直至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及一切“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所谓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早已经被当成历史的垃圾，扫出所有的舞台了；而马列的斗争和专政文化，更是在共产党政权的刺刀逼迫之下，早已深入人心，尤其是深入了新一代青少年之心。很多人都不明白，海外的人更不明白，十七年间，为什么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大学教师、大学生，中学教师和中学生，就不用说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转脸之间居然都能红口白牙地去公然诬蔑和陷害别人，都敢抡起皮鞭去抽打自己的老师，用自己的皮带活生生地抽死那些与他无冤无仇的同事、同学、朋友，甚至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还脸不变色心不跳。其实很简单，因为，十七年的“教育”——阶级斗争的教育，制造阶级斗争的教育，所谓“忆苦思甜”式的教育方式，疯狂的、残酷的、长期的、甚至是不间断的残暴镇压行为，早已经将“仇恨”培养好了，早已经将“对所有敌对阶级曾经是怎样抡起鞭子毒打和杀害我们阶级兄弟的仇恨”，甚至是“革他们的命”的决心与方式，深深地扎进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底。再加上十七年、特别是六十年代伊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热爱情结”，也早已经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发酵，就象当年的德国青年对希特勒的“狂热”一样。于是，文革便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上，在倾刻之间就被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在全社会、特别是在青少年中煽动并发动起来了。

## 二、要是有枪——她就打死红太阳！

文革爆发那年，我十九岁，面临高中毕业，是老高三，六六届，也是中学生里面年纪最大的那一届。我因为父亲57年被打成右派，所以我属于黑五类子弟，也就是“地富反坏右”里边的右派份子子弟。

象我刚才讲过的那样，文革爆发前的十七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动了十几次政治运动，已经杀害和饿死了将近六千万中国人民。因此，文革一经发动，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政治运动又来了，又有一批人要被处决，被劳改，被劳教，被斗争，被践踏，被逼自杀了。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的时候，毛泽东就亲口对江青说过：“这一次，又有很多人要自杀了……”因此，文革刚刚开始，我的内心就是一片惊惶，知道政治运动又开始了，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灾难和厄运会降临到家人甚至我的头上来。我们全家，包括亲属和朋友，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1966年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就定在7月1日。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我的成绩，在学校也算得上是第一流的了。母校也是安徽的第一所重点中学。可我知道自己是考不取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右派份子的儿子。五七年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大抓阶级斗争之后，五类份子的儿子非特殊情形是绝对不允许上大学的。无数优秀青年的痛苦命运，都已经对此做了铁证。但我毕竟是年轻人，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还是刻苦学习，准备考试。

1966年6月18日晚上12点刚过，住在我对街的一个同学，他叫胡国龄，是我中学时代最要好的同学，突然轻声叫着我的名字，敲响了我家的门。待我蹑手蹑脚地跑下楼去，刚打开门，他就一步踏进来问我正在干什么。我说，“我正在做题目”。他说，“不要做了，我们考不成大学了”！因为他家有收音机，刚刚听到的新闻，原定7月1号举行的高考，因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被宣布推迟半年。后来不到两个月，高考制终于被取消。谁想，这一取消就取消了11年，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高考。我们这一批1966年的高中生，是在1977年，也就是11年以后，才被共产党准许考大学的，第一年还要“政审”。

高考推迟了，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也全面开始了。红卫兵“兴起”了，到处抄家斗人。象我这样的人，首先是不准革命的，因为我成份不好，是革命对象的家属。文革以前，我们班39个人中，好象只有两个成份不好的；文革以后，我们班忽然有了30个出身不好的，只有9个出身好的了。但是，这9个人就统治了我们30个人。我们30个人只能乖乖地跟着他们去

抄别人的家，带着他们抄自己的家。反反复复地抄着，在抄家的过程当中，斗同学的父亲母亲，又让自己的父亲母亲去被同学斗争。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在中国古代都可以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了，他还要跟着别人、或是带着别人去干这样的事情，你想想那个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那个社会，表面上极其高昂，天天在喊口号，刷标语，处处都是革命的“红海洋”，可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多少人家在哭泣，又有多少人在为自己的父亲、母亲、丈夫和妻子被打死斗死，或者被逼自杀而偷偷地哭泣。父亲母亲被打死，被斗死了，还要被逼参加批判自己父母尸体的斗争会。如果你表现出悲哀，你流了眼泪，那就轮到斗你了。我的同学当中，有被迫给父亲贴大字报，揭发父亲反动的；有被迫给母亲贴大字报，逼得母亲跳楼自杀的。我那时作为一个五类份子的儿子，心里的感觉用“如履薄冰”都不能形容，成天心惊胆颤。

我虽然成份不好、但成绩好，被老师认为是很有才华的，吹拉弹唱，绘画书法，我样样都能拿得起来，可这些却使我成了一个“修正主义的苗子、封资修的接班人和反动学生”。所以，我心里一直在紧张地等待着哪一天大字报会贴出来。终于有一天，是在八月初，批判我的大字报终于被贴出来了，首先，就是揭发我跟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其次，揭发我说过“鲁迅要是活在现在，也会打成右派”。这话我真的说过，那还是读高一的时候。就这两条，如果没有毛泽东为了利用学生帮他造反打刘少奇，及时地发布了“十六条”，策略地禁止学生斗学生，我这条命大概不会活到今天。所以，我也应该“感谢”毛主席。

顺便想说一说的是，十七年中，你要问到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感受，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最伟大的领袖，当作“人民的救星”。报纸上是这么说的，教科书是这么说的，社会上是怎么说的，每一个父母也是这么对子女说的。所有的人，从最有思想的知识份子，到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都会这样来回答你，而且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但以我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即便是在那时，我以为还是有很多有知识的人对他抱有反感。但，第一是不敢深想，第二是想了也不敢去讲，第三就是那种恐惧的心态，使他们强迫自己认为，自己所想的是不正确的，是反动的，起码是要倒楣、要坐牢、甚至是要杀头的。至于文革一开始，就把毛歌颂成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自然谁也不敢说个不字。

串连开始了。

由于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中共一直是依靠各级党委来发动运动、领导运动，来整所有他们想要整的人。文革开始时，刘少奇也是照样办理，派工作组，打反革命。再加上当时刘少奇的势力太强，中央委员和各省省委书记绝大多数都是刘少奇的人，这样一来，毛泽东想要整掉刘少奇的整个班底，就不可能了。所以毛才会下决心利用自己已经被神化了的领袖形象，和数十年来已经形成的权威地位，再加上高高在上的神秘光环，决心“从下而上”，而不再是“从上而下”；决心“由外及内”，而不再是“由内及外”地来发动这场政治运动，发动群众和学生起来造反，号召北京学生大串连，要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点火，去冲击党政机关，把全国各地的反都造起来。而各省的共产党书记们在一个地区统治了那么长的时间，一般人是斗争不了他们的。可是，毛主席从北京派来的红卫兵，却能够把他从家里抓出来，挂上牌子，进行批判斗争，连他们都被斗了，下面的火也就自然烧了起来。而为了把刘少奇和他的党徒们一网打尽，为了保证一切都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这个文革的大方向不被转向，毛就不能不进一步向全国发出革命造反的号召，就要允许全国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一起去串联，而不能再象运动初期一样，一部分可以革命，一部分却不准许革命。而他发动的手段，就是在北京接见全国串联到京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所以，连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弟，都可以参加串联上北京了。

8月底，我们全班同学决心集体走路去北京看毛主席。我们过了长江，只沿着铁道走了一小段路，就扒上火车赶到了北京。

那一天，8月31日，在整个天安门广场上，在五十万年轻学生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我心里所感觉到的，还是“恐惧”这两个字。虽然广场上绝大部分学生都怀着无比的真诚和无比的崇拜，在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但是，这里面一定有因为恐怖而高喊万岁的人，因为痛苦害怕而高喊万岁的人，心里埋藏着不满却要求自己高喊万岁的人。我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女同学，这个人的名字我现在还是不能说。那一天，我和她一起就坐在天安门广场升五星红旗的汉白玉台阶下面，等着毛主席、贺龙和林彪乘的军用吉普车开过来。车终于开过来了，我们立即狂热地高喊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来了。我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是不得不跟着喊，还要努力喊得别人都听得见，其实我心里一点也不想喊。可一边喊，一边心里还直哆嗦，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激动、还是在害怕，反正是有什么感觉都有。而我身边的这个女同学，她虽也举手喊毛主席万岁，可就在大家都发了疯、根本注意不到她的时候，她竟突然在我耳边低低地又是急促地说了一句话：“要是有了枪，我今天就打死他！”那一刻，虽然她把我吓得连心脏都不会跳了，但是三十多年来，我在内心里却一直埋藏着对她的深深敬意和佩服，一直把她看成那个敢于刺杀列宁的俄国女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尽管当时，我在万分紧张的那一刻，曾猛地回过头来死死地瞪了她一眼。因为我知道，如果这句话被谁听见了，她，甚至包括我在内，就会被立即踩死在那面血红的五星红旗之下，连逮捕和斗争都用不着了。

### 三、父母逃过一劫，我做了逍遥派

毛主席接见完了，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就被班上那几个出身好的红卫兵召集在一起训起话来了。说北京的红卫兵已经讲了，任何成份不好的人，都必须立刻离开北京，要我们当天就滚去安徽去。我们班上那几个成份特别好的干部子弟，就把我们这三十个人赶到了北京火车站。那一天，北京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一眼看去，全都是一片“花头”——男的，大都头发被剃光；女的，全被剃成了“阴阳头”；脸上冒血的，身上带血的，正在挨着红卫兵的皮鞭子却一声也不敢吭的；还有就是被吓得惊慌直叫的孩子，满广场都是。红卫兵们——北京的高干子弟们，穿着军装，带着红袖标，手里拿着皮鞭和军用的宽皮带，就在他们的身上任意地抽来抽去。后来我才听说，这一批人，总数约有四千，全是被红卫兵遣返原籍、送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改造去的。其中有一个少年，现在已经是美国的一位高级工程师了，在旧金山工作，还曾是民运人士，他告诉我，当时，他才十岁，说起那时的情景，他仍然耿耿不已。因为红色的首都北京是不能容许“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们生存的。

你想，当时我是什么心情？我是一个从小就爱好文学的人，读了很多书，又多多少少受了些家庭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多少了解一点。我看到这种情况，除了恐怖以外，就是一种厌恶。我不敢仇恨，但我有厌恶感。我这种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不是很多的，因为我明确地对这场所谓的革命感到“厌恶”。与那些至今还在海外怀念他、甚至是歌颂它的人，实在是“风马牛不能相接”。

当我们这三十多个人刚刚走进北京火车站的时候，就突然听到一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歌声。原来是北京的一队红卫兵们，正唱着这首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北京车站的大厅里面。这时，我们突然看见一对红卫兵走到一个穿着褐色香云纱衣裤的老太太面前，大声喝问她：“你来北京是干什么的？”

老太太忙说：“我是来看儿子的。”

其中一个女红卫兵又问她：“你从哪里来？”

“我从香港来。”老太太哆嗦着回答她。

女红卫又问：“你的儿子在北京是干什么的？”

老太太忙忙地说：“我的儿子是冶金部的局长，叫X X X……”



那个女孩子连话也没有听完，就立即嘶叫道：“他是叛徒，早都被我们打倒了！”

说着她就举起手中的那一跟带铜扣的宽军用皮带，唰的一下，便从老太太的头上抽了下去，鲜血立即从老太太的脸上喷了出来，老太太就这样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那一刻，我们都瞪大眼睛看着，谁都不敢吭一声，直到这一队红卫兵又高唱着“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歌声，从我们的身边扬长而去。

那天，从北京上车以后，我就挤在卫生间里面，足足站了十八个小时，第二天才到蚌埠，转了车，过了江，到了家，我就问父亲说：“你解放前当校长、做教授的时候，对家乡人很好，你还说帮助过三十多个家乡的老百姓，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我说，“你一定要说老实话”。

父亲说：“我没有跟你说假话，我救过很多人。我还救过很多共产党。”

我说：“那好，那你就听我一句话，马上跟母亲回老家。”

我怕他不明白又解释说：“北京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已经开始了。不仅是斗争，贴大字报，到处抄家、打人，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打死五类份子。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他们虽然把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赶了回来，但他们很可能跟在后面就回来了，因为他们学了北京的‘革命经验’，一回来就要大张旗鼓地干了……”

“爸”，我说，“你比较镇静，妈就不一定了，她很爱面子，如果让你们俩站在家门口，斗争你们，剪你们的花头，你恐怕还能忍受，妈妈可能会一头撞死算了，撞不死也会被他们打死……”

我的父亲出身贫寒，但我的母亲却是大家闺秀出身，我特别担心她过不去这一关。

我一点半钟到家，三点钟说服了我的父母，四点钟之前我已经赶到派出所，把我父母的户口主动迁到了老家农村。派出所居然一点也没有刁难我。

我父母终于在家乡躲过了这场浩劫。做为被强迫改造的内容，每天早上，我父亲必须去镇上扫一条小街，除此以外，乡亲们很照顾他。是他一生的德行救了他。七五年，当他戴着“右派帽子”死的时候，不单许多乡亲主动为他送葬，镇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母亲还主动叫人将自己的寿材抬到了我们的家里。这是后话了。

那天夜里，我把父母安顿好之后，凌晨四点，我就过江回到了在芜湖的家，我那两个八岁和七岁的外甥女，竟立刻从楼上扑下来，哭着说，“小舅，家被抄了，你的胡琴也被砸断了……”。我一看，整个家被砸得一塌糊涂。那天晚上，我就坐在地上，一左一右抱着两个小外甥女，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就是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我下了一个决心：决不参加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我，作为一个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从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造反队的根本原因。因为，以我当时浅显的历史知识，我已经确认：这绝对是一个“不讲天理和毁灭人性”的革命。

我承认，我做了整整十年的“逍遥派”，但我读了十年的书。那十年，我几乎将我所能够搞到的“封资修”全读完了，而且还读得很系统。如果我这一生还算是多少有一丁点真成就，实在与这十年关系很大。为此，我今天还是要感谢我的那几个同学，他们常常去抄家，查封图书资料，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封资修”书籍，他们就会偷偷让我捡回来，我便把它们当成了宝

贝。

我这样的人，虽不够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但自己也是不想参加这场所谓的文化革命的。我是另外一种典型，说是“反动学生”的典型也行，1968年秋，当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也进驻了我的母校时，那个强奸了我们27位女同学的军宣队长和整个就是一个流氓的工宣队长，就公开的说过“高尔品是全校最反动的学生”。

我承认，若是按文革的标准，而且不论是哪一家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标准，我都是最“反动”的。因为，我不但在文革十年间未参加过任何一次造反，而且整天都在读“封资修”，并且认真做笔记，写心得，不单将中国的一些古典文论，比如《文心雕龙》里面的许多篇章都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还自己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纲要”，对西方的哲学家们如数家珍。我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练二胡，却只拉名曲、绝不拉革命造反歌曲——诸如“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之类。在文革中，我拉二胡拉出了名，却没有为“革命宣传队”宣传过一次“革命”。我只在一位同班同学因武斗被打死以后，在他的追悼会上为他拉过一次“江河水”，那是唯一的一次。我每天的功课，就是读书、拉琴和写字——年少时，故乡找我要字的人可不少。还有，我只要有机会不戴毛泽东的象章，我就不戴；只要有机会不让我读毛主席语录，我就不读（如今，许多人听我讲演，都夸我的记性好，但我却背不出几段毛主席语录。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只引用了两句毛主席语录，等到书印刷出来，才发现“最高指示”居然掉了好几个字）。我与那些虽然出身不好、却非要拼命去参加文化大革命、争取造反的资格、或是非要拼命去表现自己“革命”的人，确实不一样。但我理解他们，就象我理解有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能将毛泽东的象章活生生地别在自己胸前的肉上，以表示他们“革命”，表示他们对毛主席的“忠诚”……。其实，说到底，他们还不都是让那个时代给活生生地逼迫出来的吗？对他们首先应该是理解和同情。

但是，我似乎更应该承认的是，我并非是因为觉悟和觉醒，才会有这般“反动”的表现，不是。我只是逃避，只是厌恶，却绝然没有上升到追求民主和自由的高度，一丁点也没有。因为在铁桶一般的黑暗之中，在专制的血腥味已经成为整个时代的氛围之时，我们的先人和前辈曾经不屈不挠地为自由和民主献身的故事和业绩，早已被玷污在共产党和共产革命的血淋淋神话之中。如今还活着的人，谁又能说，谁又敢说，他是那个时代的民主和自由的追求者和战斗者？如果有，并且敢于表现出来，那么，他就只会象“反文革第一人”——真正敢于造“毛皇帝反”的上海英雄刘文辉一样，会立即被枪杀在毛泽东党主专政的龙陛之下。虽然，那个时代，似乎也还有几位为了高举红旗而牺牲在红旗之下的勇士，但那与欧洲中世纪曾忠诚地惨死在宗教裁判所里面的殉道者们，又有什么区别？我钦佩他们，但不认为他们就是民主和自由的先驱。就不说那些自始至终都在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英雄们了！我同样理解他们，但那不过是时代所造就的荒唐闹剧和无边罪恶而已。他们本身又何罪之有？一九八六年夏天，也就是中共发动文革二十周年之际，那位二十年前曾领着红卫兵抄了我家、却又扑了一个空的同学，他叫陈敬农，想来看我，想向我道个歉，但又怕我不愿见他，便请另外一位同学转告给我，说他想起当年的事情，就很内疚，想当面道个歉。我不但没有拒绝见他，还特地请他来家里吃饭。席间，我看他仍然有不安的表情，就真心地说：“那种岁月，不论是你这样造反抄家的，还是我这样被造反抄家的，都是受害者，都是受骗者，罪恶全在毛泽东一人，你我何罪之有？”因我说的真诚，他也显得很感动。我们又成了好同学。听说，他如今在事业上很有成就。

#### 四、文革的客观效应——朦胧的觉醒开始了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反动派总是要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毛的这句话语录，我不知道是否又记错了。但毛肯定有过这样一句类似的“最高指示”。

然而，毛确实是自己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因为，正是在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亿万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被捧到了众神之神的巅峰地位，却终于被历史无情地摔了下来。那倒不是因为他矫情时说的，是因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是物极必反，“泰极否来”。是因为他作恶万端，必然要“现世现报”。而这个现世现报，就是林彪事件所带来的，人民对他的最早觉醒，虽然只是朦胧地开始了觉醒而已。

从文革爆发到林彪事件以前的4、5年间，我因为接触过很多象我这种出身于知识家庭的人，所以，我知道，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人，在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文革实际上是深恶痛绝的，他们与一些在文革初期及后来的造反中“领过风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们确实有些不一样。那时，尽管我们也必须站在人群中高举着红宝书高喊毛主席万岁，实际上我们心里明白，他完全是在倒行逆施。但是，大部分人却由于盲从、害怕和恐惧，而不愿也不敢这样去想。

可是，林彪事件却使得中国大多数的人，对毛泽东和他的文革开始有所觉悟。全国人民通过林彪事件发现，所谓文化大革命极可能是一场骗局。不论是毛泽东要打倒的人，还是曾跟着他要打倒别人的人，都被他整惨了。而“571工程纪要”所揭露出来的“毛泽东是绞肉机，是B-52轰炸机”的可怕说法，就更是使人民在心头轰然一征。大家在讨论文件时，虽然个个都讲，毛主席他老人家真英明；回到家却偷偷地说，林彪好象没有说错呀，毛也太不是个东西了，还不如让林彪真的把他干掉了才好呢！

所以说，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觉醒，是从林彪事件开始的。这是文革十年当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尽管人们非常痛恨林彪站在毛泽东身后举着小红书的谄媚形象；痛恨他在文革当中，曾利用手中的枪杆子为毛泽东维持过那个浸透着人民鲜血的万恶政权……可是，他的死，他所遭遇的“913事件”，确确实实还是让大多数人对毛泽东及其四人帮有所觉醒。但那时，绝大多数人，主要还是认为，那是坏人当道；而被毛斗争和打倒的刘少奇、朱老总和陈毅等许多老干部，还是好人。其实这一批人，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挨了整，他们在文革之前的所有政治运动中，都是打人和整人的；他们在之后的一九八九年，其大部分都是支持邓小平在北京屠城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当然，那已经是后来的认识了，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觉醒到这个份上，包括我本人。周恩来死的时候，我还流过眼泪。今天，我觉得自己同样愚蠢和可笑。

林彪事件后，我中学的一位数学老师曾经在深夜的学校大操场上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他还说，“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我才敢对你这样说……”

那一天是1971年12月31日。

那个夜晚，我们只远远地走在操场的边上，却不敢穿过操场，走到另一边去。因为操场的另一边是一个土坡，土坡上挖着一个长幽幽的小“山洞”，“山洞”里放着上百具棺材，全是武斗中被打死的学生和工人尸体，还没有下葬。

深夜回来以后，我因为内心充满着苦痛和窒息的感觉，就伏在我的小床上写了一首诗，题目叫“一九七一年的月亮”，一百五十多行，至今我只记得其中四句了：

……

我们空虚而又愤懑，  
我们镇定但有胆怯；  
面对着一九七一年的月亮，  
用我们冰冷的笑声向它告别……

虽然告别了一九七一年的月亮，却还是迎来了一九七二年那个风狂雨暴的中秋。那天傍晚，我坐在小阁楼里，面对着雨后窗外那一片“枝桠横折、翠叶纷劈”的中秋景象，虽痛心疾首于“竟大地精英，瞬遭劫掠”，但还是为“一腔热血”所鼓舞，大着胆子“挥毫奋书、洋洋洒洒、狂歌聊发吐衷曲”，最后甚至敢于“笑苍穹，看烟飞云敛处，皎皎明月”了！当我把自己“放狂”的时候写下的这首词，偷偷地却又是得意地让我的大哥看时，没想，他只疾速地掠了一眼，便三下两下地把他撕了个粉碎。从来儒气甚深的大哥，年轻时的北大才子，此刻竟然低声而又急促地瞪眼对我吼道：“你自己不想活，还想害一家人都活不成吗？！”

确如大哥所说，要是被发现了，那就跑不了要遭殃，特别是我这等出身的人。那时，我还偷偷地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那可是我此生所写的第一部小说，题名叫“春澜”，就是写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中苦难历程的。可惜的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因被我的老师逼迫，将它偷偷地烧掉了，虽然我的老师宽慰我，说我将来一定有出息、有成就，但是，那一刻，热烘烘的火焰，就象是烧着了我的心，那种心疼，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

这不能形容的心疼，这充溢着太多激情的青春苦痛，却使我想起了一九六八年的那个夏天，也就是在武斗最激烈的那些日子里，我曾与我的几个好同学一起聚首在我住的那个破烂小阁楼上。那一天，面对着血红的残阳，我曾即兴挥笔写下了一首诗：“青春的血沸腾在胸际”，并立即由在地区文工团拉提琴的同学王小明，将他谱成了曲子。于是，一时间，小明的提琴，我的二胡，革命宣传队大吴的手风琴，还有几位同窗高声嘶喊的“伴唱”和拍桌子打板凳的“伴奏”，便一起在我的小阁楼上“沸腾”起来——青春的血，痛苦的血，就这样汹涌在那个“太阳最红、人间最黑”的岁月里面……它当然与那个造反时代的主旋律背道而驰，与那些还涌动在街头、高喊着要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各派造反洪流大相径庭，更与那些正在为互相仇杀而呼啸的子弹毫不相干……虽然，在他们的眼睛里，我们不过是一群不敢革命的懦夫，甚至只是几个还没有受到惩罚的阶级异己份子而已……可惜的是，他们倒真地把我们忘却了。而我们，却因此而获得了一丁点“喘息和自由”。

当然，“闹”够了之后，我们还是要后怕的。但我们也有不怕的理由，因为除掉我，小明和大吴毕竟都是革命宣传队的，是拉革命样板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的”……。

从林彪事件一直到毛泽东死，虽然文革还不能算已经结束，但毛泽东的君主式军事独裁统治，却稳定下来了。他终于能够做到“叫刘少奇死，刘少奇便不得不死；要彭德怀亡，彭德怀便不得不亡；让林彪从天上摔下来、林彪就不得不从天上摔下来”的残暴君王了！

不过，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终于发现，周恩来在党内国中的威信已经超过了。为了搞掉周，他又搞了一次“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又发动了一次造反，弄得全国上下鸡飞狗跳……。毛如此这般地倒行逆施，不仅使老百姓开始了觉醒，连他的那些党徒们也有很多开始觉悟了。晓得大家全是他的“炮灰”。晓得他就算是一个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坏皇帝！

当然，对毛泽东的死和周恩来的死，当时人民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毛泽东死后第二天的下午三点整，中央电台向全中国广播毛死了。我的一个同学，匆匆忙忙地跑到我家里来，跟我轻声喊道：老毛驾崩了！我说，死了？（他说：）死了。我说，怎么办？（他说）上街看看去……正说着，另几个同学又来了。我说，那好，就一起上街看看去！等我们走到街上一看，街头喇叭里正“沉痛”地广播着悼词，但大街上，却没有一个人哭，没有一个人喊。每一个人的脸都铁青着……什么叫恐怖？这就叫恐怖。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敢说，不敢笑，甚至连哭都不敢。谁都不吭声。看到了熟人，也只是瞥一眼；碰到当官的，连眼光都不敢与之相对。当然，还有一种眼神，是有“会意”的意思的，但外人是看不出来的。比如我们。那一天，就有一个工人，

因知道毛泽东死了，居然写了一首诗，曰：“红太阳落山了，大地一片漆黑……”，结果因被造反派揭发他是诬蔑“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而被逮捕，还判了三年刑。你们说荒唐不荒唐？

我们几个人就这样在大街上逛着，一个同学突然问我，“你身上还有钱吗？”我说，“我身上还有七块钱”，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8元零5分。但我因突然意识到了他话里的意思，便立即低声地说：走，吃饭去！说这话时，我的那种不敢跑到脸上的快活，还有那几个同学听我说这话时的快活，那一双双眼神，简直就没法形容！是的，毛泽东死了，我们心里是真快活，是真的快活得不得了！说着，我们就走到芜湖当时最大的一家饭店，名叫“同庆楼”的，可等我们走进时，我们全傻了，因为已经全部坐满，只在拐角上还有一张空桌子。那时才下午五点多一点，六点钟都没到。但满是顾客的同庆楼里，却没有一个人讲话，没有一丁点哭声，满大厅里面，只听到酒杯碰得咣当的响！全在“撞杯”呢！于是，我们每人都把身上的钱掏出来了，凑足了10多块钱，八菜一汤地大吃了一顿。我从来不喝酒，但那天，我喝了，而且喝的是高粱，喝得头一点也没有晕！我第一次知道自己还挺有酒量。

所以，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客观效应，表面上，它的轰轰烈烈的杀人镇压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它对中国人民的迫害，特别是在精神和心理上，却不及文革前十七年。由于它扩大了“反革命”的阵营，在全中国把那么多的共产党干部都变成了反革命，它使人民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承受力，变得前所未有的强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在度过了1966年的那个残酷的夏天之后，我们的心情，比文革前17年，比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感觉反而还轻松了一点。为什么？就是举目一望，人人都是“反革命”，心理压力和痛苦自然顿时有所减轻。文化大革命当中，许许多多曾经整人害人的共产党干部跟被他们整治迫害的阶级敌人住在同一个牛棚里，一道接受批斗和凌辱，被整治和迫害的人民，其心理自然就得到了一种想象不到的调整。虽然这种调整本身就是“被扭曲”。所以，1979年，当邓小平为了收拾人心，而采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大多数被平反的，都是在53年的三反五反、54年的思想改造、55年的肃清反革命、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57年的反右、59年反右倾、62年的狠抓阶级斗争和64年的四清运动中遭受迫害者……海外华人，西方学者不了解中国，特别是那些台湾学者们。他们都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共产党对人民作孽最多的一个阶段，其实共产党作孽最多的是文革前的17年。因为，正是在17年里，共产党用制造阶级斗争的残酷手段，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离间了所有人之间的正常社会关系，毁灭了中华民族几乎所有的好文化，扭曲了人民原本单纯的心灵，培养了整整一代政治变态的青年，更连续的发动了十几次残酷的政治运动，才终于为毛泽东发动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历史的全部准备。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党内与刘少奇争权夺利的问题。可是高高在上的毛泽东，面对着早已掌握了实际权力的刘少奇，他要靠通常的党内斗争的方式已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必须是拼死一搏，以求绝处逢生。所以他才要发动红卫兵，发动群众，发动不知真相的人民，起来帮助他搬掉自己政治上的敌人刘少奇及其同伙们，结果是曾经将毛吹捧到“神”的地位的刘少奇，彻底地被毛和他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斗垮了。我倒是但愿那个时候，中国真地还能有另一个革命，一个真正敢于造专制魔王毛泽东反的真正人民革命。因为，人民要是真的有觉悟、有权力、有力量也发动一场彻底推翻毛泽东和共产党之极端反动、残暴、黑暗统治的人民革命的话，那该有多好！

可惜的是，朦胧的觉醒才刚刚开始，离开真正要走上向共产党发动革命造反的觉醒，还“路漫漫兮其修远”矣！

因为直到一九八九年春天，那些曾说自己在文革中就敢于并已经造过共产党反的人，竟依然在哀求着共产党“推行改良和施行仁政”；甚至在一九八九年那个大好造反时机中，那三位真正要造毛泽东共产党反的湖南青年壮士，居然还被送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嘴钢牙之中；以致

到了今天，我们一些在文革中造过反、现在倒真的是在搞民主的朋友，都还摆脱不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至深“恋情”……就不说一些还在年复一年地高喊着反对革命，高喊着要对至死都在迷信暴力镇压的共产党实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将中共党魁吹捧成为举世无双之“明君”的朋友们了！

## 五、一个逍遥派眼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不论是哪一派红卫兵和造反派，都是毛泽东、共产党发动文革的受害者、受骗者，只不过他们与“被造反和被迫害者”的“遭遇方式”不同罢了。因为一切的血海深仇都应该记在万恶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头上。我想，“理解万岁”这句话，用在这里，才是最好不过的了！这便是当年逍遥派“自醒”的结论。

我们确实需要自醒。

还是说当年的事情吧。

那时，在我的同学当中，成份好的造反，成份不好的，由于毛主席发布了“十六条”，说学生不准斗学生，但都能造反，所以大家都造起反来了。他们之间，当然也互有斗争，因为在老红卫兵和新红卫兵之间，还是明显地存在着很深的隔阂的，而大部份隔阂甚至仇恨，还是来自文革前的“压迫和歧视”和文革初期的“迫害与仇恨”。但他们一是都要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一点上，他们从来“不敢不一致”；二是共同去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老五类分子和“叛徒、内奸、工贼、特务、走资派”新五类分子，特别是斗争那些49年以后已经被斗了不知多少遍、只是还没有被斗死的人，各派红卫兵造反派都不敢落后和不甘落后。在文革当中，我好像至今还没有听说过，有任何造反派红卫兵，保护过他们，保护过他们这些过于苦难的人民，保护过后来被证明都是冤假错案的各类份子们，即共产党的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们——难得他们都不算人民吗？特别是在他们遭遇斗争、迫害、酷刑、甚至是种种非人的摧残，以至于痛苦地被劫夺了宝贵的生命时……。相反，更多的却是“助共为虐”。虽然，我理解，因为，我也不敢——谁敢呢？谁曾敢过呢？划清界限还来不及呢，不划清界限就能当上造反派头头吗？

我还想说是，当时参加造反的人，其出身、背景和具体的动机确实并不完全一样。但他们虽有差别，但不论是哪一队红卫兵，哪一家造反队，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都是要坚决紧跟照办的，都是在高喊着要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哪怕真的是心有“异端”者也绝然不敢不如此，虽然——这样的人是极少数。但我在前面说过，不论是何等何样的造反派，他们在批判、斗争和迫害“地富反坏右”和“特务叛徒走资派”的时候，“起码在表面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运动初期曾不许造反的人，或曾经被斗争过的某些人，其中确实存在着因报复心理和对抗心理而举旗造反者。比方说，在我们中学，就有由干部子弟、团支部书记和成份好的同学所组成的红卫兵大队部，简称“红大”。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敢死团”，其中有一部分是在运动初期被整过的，但也有人曾跟着别人整过其他同学。这两派虽然带着他们之间的新仇旧恨互斗，但对毛泽东的任何伟大号召和最高指示，他们都是一概地坚决执行，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敢有任何抵制。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因为文革所有的造反者，都必须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旗，高举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旗，高举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旗，高举着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红旗，才能获得造反革命的“许可证”。这是文革所有造反派的根本特征，毫无例外可言，也不可能例外。

我这样说，因为我是旁观者，而不是“参加者”。我身上缺少为誓死保卫毛主席而造反的感

情要求和“理性”动力。姑不论那种为誓死为保卫毛主席而造反的感情和动力，究竟是真诚的，还是盲目的，抑或还是“莫须有”的，甚至当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也不论“打着红旗反红旗，必被红旗所打倒”，反正他们都不属于“为人民而造反”的感情范畴和理性标准。

在1967年的夏天到1968年底的疯狂武斗岁月里，各方造反派虽然拥有着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其互相间的武斗虽然震惊了全国，让人民胆颤心惊，却丝毫也没有震撼毛泽东刚刚重建的残暴革命政权。因为，不论是那一方造反派所射出的子弹，虽曾夺取了无数的、无辜的青春和生命，却没有一发子弹是要“为人民”而射向独夫民贼毛泽东和他的无产阶级残暴政权的！各类造反派们是在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而互相恶斗，是在为期望毛主席他老人家承认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而相互射杀，甚至仅仅是因为自己充当了炮灰的委屈而自轻自贱自身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有一点特别重要，是所有的人都不该忘记的，那就是：毛泽东虽用“路线斗争”，来残酷打击他自己在党内的敌人们；但毛泽东为了保证他路线斗争的胜利，却从来没有忘记、也不敢忘记要继续“制造和调节”阶级斗争，并且要把阶级斗争这根“弦”永远都绷得紧紧的。这便是他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更是他在大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之时，却一再地要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原因。当然，这也就是毛泽东于旨在斗倒党内走资派的同时，却一定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根本原因。因为，在他看来，阶级斗争才是他进行路线斗争的保证。而唯有将所有的阶级敌人都压迫得、斗争得、打击得依然不敢乱说乱动，他的一党专政照旧固若金汤，他才能真正获得自己进行路线斗争的胜利果实，才能实现他对自己那个党的一人专政、即党主专政。也就是说，虽然斗倒斗臭了刘少奇，可共产党的天下，还是他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不了解这个症结，就不能了解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虽然风急浪高，却能够安然夺权的根本原因。而“这也才是意在借口打倒走资派、其根本目的却是要彻底打倒毛自己政敌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真正遭殃、遭难的，还是无数无辜人民的真正原由。而在整个文革过程中，那根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之弦，基本上就是由各地造反派在帮助他蹦得紧紧的，特别是在公检法被砸烂之后，和在结合了造反派头头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政权之后。在大抓阶级斗争、大打阶级敌人上，各色造反派均可谓毫不相让。虽然，我相信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不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还是“为之”了。

整个文革当中，无数冤死在红卫兵、造反派，和后来由他们参加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或干脆是由他们组成的“专政队”手下的知识分子和无辜民众，都早已对此作出了无数血腥的证明。

一直到1968年底，当毛泽东的批臭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革命部署早已完成，各派红卫兵、造反派却因为大打派战而“干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毛泽东先是开始对不听话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实行“劝压”，随后则派出军宣队和工宣对占领上层建筑取代造反派，接着便决心要对那些曾为他充当过炮灰、如今却满肚子委屈、因而开始不听他话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实行镇压了。虽然，有一些地区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进行过抗争，甚至是不惜生命地予以过反抗，但是，正是因为只是为充当了炮灰的委屈而反抗，而不是要为悲惨的民众而反抗，他们的反抗才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就注定了要被彻底剿灭的下场。虽然不可否认，他们当中也出现了觉醒者，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也有了最初的觉醒，甚至也出现了极少数真“想”造反者，但因民主和自由的根本觉悟尚很遥远，巴黎公社的反动原则（——反对三权分立、要求立法与行政合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在蛊惑其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血腥信仰还根深蒂固，共产党带着污血的革命红旗还在向他们闪烁着暗淡的光辉，他们的下场当然是可想而知。因为，高举着魔鬼的旗帜而想反抗魔鬼，结局只能是被魔鬼所吞噬。所以，当毛泽东和共产党将他们该杀的杀，该剿的剿，大致收拾停当之后，便干脆把我们老三届中学生全部下放到农村，将拿着工资的大学生送进军垦农场，就是将那些曾经按照他的号召去造反的，而今却

有些不听话的“革命小将们”，全部送到农村去接受贫农下中农的“再教育”。说穿了，就是把他们分散开来，以便将他们淹没在贫下中农的汪洋大海之中，去接受“思想改造”和实行“劳动改造”……

红卫兵和造反派终于成了一页血腥的历史，虽然那血色的革命造反红旗上，浸透了无辜人民的鲜血，甚至是他们自己的热血。

怅望千秋一洒泪，文革已去三十春。历史自然会将人类发展史上的种种浩劫，在与那一场由毛泽东和共产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了认真比较之后，得出它确乎是“史无前例”的悲惨结论。而且，不论谁出于感情原因而要去粉饰它，还是要借粉饰它来寄托自身的感情；也不论谁还想在文革的血海中，捞出几件浸透了人民鲜血的革命造反“珍品”来，“史无前例”的这面镜子，都只会再一次送给我们“荒唐”二字而已。或曰：纵然是“满纸革命言，一把造反泪”，最终亦只能让朋友们“都云作者痴，尽解其中情”。

如果我说得不对，还请当年的造反派战友们原谅，因为那时，我毕竟只是一个可怜复又可恨的“文革逍遥派”。

□ 原载《黄花岗杂志》

~~~~~  
【难忘岁月】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三）

• 刘光耀 •

六、“保守”组织的再崛起

遵义队等组织垮台之后，我和几位同志一起多次议论，到底该怎么办，总得继续奋斗下去，又总不能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1967年2月7日，化学系女教师李健美、历史系教师李志学、艺术系干部张俊民、体育系教师李贵锁和我5位共同商议，决定立即秘密组织队伍。

2月9日，八二四在开封日报社静坐，围观者很多。人们忘记了这一天是春节，中午才听人说“今天是春节呀，哪有过年的气儿？”

下午我们几个人开会，给我们的组织定名为“挺身而出革命造反兵团”。为了安全起见，我被安排住在西门里粮站内。在那里，我起草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开封师范学院挺身而出革命造反兵团宣言》，提出：“《十六条》是我们的行动纲领。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组织原则。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的榜样。广大工农群众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的任务。敢担风险，不怕牺牲，是我们的誓言。”另一个是本组织的《声明》，共6条，表明对解放军、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委员会”、“2.8”事件等的观点和态度。落款日期是1967年2月11日。这两个文件很快被空军某部铅印并用飞机撒向开封全市及郊区。

2月11日凌晨，“开封市革命左派造反司令部”（简称“左司”，化肥厂牵头的工人、干部组织，赤卫队已解散而加入其中）和郊区农民组织“1.25兵团”包围了开封师院，市公安

人员进入抓走了一批八二四骨干。数学系原遵义队成员吴集基，因对这一行动不理解，在大街上与人发生了争执，公安人员从吴的一个同事了解到吴的名字，吼道：“刘集基，走！”“吴”被误听为“刘”，从而也被捕。

这一早，人们还看到了很滑稽的一幕：顺河区机关的群众见到了一位瘦小男子，说：“就是他！”几个人就要抓他，他马上解释说，他本来是战斗师一方的，早就看出八二四是反革命！围观者不少人笑了。顺河区的人说，算了，不理他！原来他作为“猛攻市人委挺进兵团”的成员之一，在顺河区批斗该区党支部书记时，他打了被斗者，“他比教师、干部中的老八二四还八二四”，引起了该区群众的强烈不满。

2月18日，开封市的群众组织夺了被造反派控制且有众多人护卫的市广播站，造反派的锐气严重受挫，局势大变。市公安局宣布八二四是非法组织，要予以取缔。20日，红卫兵团返回师院，在校内游行示威，观看者很多，有很多观看者也随在红卫队伍的后边参加游行。没过几天，师院除“挺身而出”外，又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兵团”、“无产阶级专政兵团”、“五七革命造反兵团”、“红色革命造反兵团”（末两个后来联合成“五七联合兵团”）等群众组织。本来，李健美等准备让我做挺身而出的公开头头，但由于数学系的教师、干部不愿意脱离学生，我也不想脱离数学系，在我帮助为挺身而出发展了一大批教师、干部成员之后，就回到了数学系。开封市中学生组织是“第三革命造反司令部”和“红色革命造反总部”，前者简称“三司”，后者简称“红造总”；与“左司”一起简称为“左三红”。真是时髦，新崛起的群众组织名称大都冠有“革命造反”的名堂，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说明紧跟毛主席，就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3月8日，一军按照中央要求派军训团进驻师院，对全院教职工生进行军政训练。训练的目的，是消除无政府主义，教育、动员群众组织解散，实现按班级、系、院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揭批走资派。

军训期间，“老保”组织了对八二四的批判。数学系部分教师、干部经常在一起议论、分析形势、研究策略，然后由我执笔写成大字报。第一篇大字报是3月12日写的《我们应该干什么？——议开封师院革命派的战斗任务》，油印成传单。3月18日和20日写了两篇整风的大字报：《弄清思想，触及灵魂》、《打倒“私”字，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为了瓦解八二四，3月18日和25日张贴出《卫东十二分队的问题还不严重吗？》、《卫东十二分队罪行续》，并油印成传单。这些大字报的落款均为“红卫干革命支队”。

在大礼堂批判了卫东队头头之一王钦韶，主要发言人是原遵义队倒向卫东队的一位骨干成员。可是，正是他，在“一月风暴”中，也是在大礼堂这个位置，反戈一击，长文批判李天增。凡经历过“文革”的每一个成年人，他的思想，道德，情操，心理，性格，兴趣爱好，当然包括政治品质，都表露无遗。有一种“风派人物”，在对立的两派群众斗争中，如果他所在的一方被另一方击败，他就倒向另一方。其中极少数者，跟风跟得特别快，而且立即反戈一击。这极少数者可以如此反复多次。所以，有人戏言：“这些人所戴的红袖章，可以做一件红棉袄。”这种人为两派大多数群众所不齿。可就是这些人，“文革”后还往往被委以官职，甚至爬到厅局级高位。

经过“2.11”和“2.18”两次大的战役，开封市造反派虽然严重受挫，但其少数数骨干分子并未停止活动。他们或在厕所，或在夜间写标语，如“油炸公安公社”（公安公社是市公安系统的群众组织）、“坚决和8172部队中一小撮混蛋血战到底”等。

以上这些，都是在所谓“二月逆流”中发生的事情。

北京的反击“二月逆流”，为全国各地受压的造反派带来了反扑的契机。

3月3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1967年第5期发表的、署名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其中引用了不少毛泽东的话。人们都认识到这是打向刘少奇的重型炮弹。群众不明真相，大家都为之欢呼，“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声响彻云霄。4月2日，开封师院八二四借着这篇文章和当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公开活动了。他们在全院、全市张贴大标语。中文系两个学生写大字报攻击军政训练团。稍稍安定了一小段时日的开封师院又乱了。

4月3日，我写了《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新反扑》的大字报。针对一些所谓《北京消息》、《北京来电》，4日、5日，又写了《阶级斗争是无情的》、《赠给一些同志》，奉劝一些人不要轻信“消息”，不要再上当受骗。10日，我写了《当前三项战斗任务》（一。批判《论修养》；二。揭露八二四复活的阴谋，批驳其反动谬论，批判各种主要错误思想、糊涂认识；三。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争取中间力量）。13日写了两篇：《告受八二四一小撮反动家伙蒙蔽的同志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相信不相信人民解放军？是相信河南、开封的广大人民群众，还是相信北京某单位的“声明”？》（指“首都红代会”支持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的声明）。15日，根据八二四的《几个为什么？》我写了《也问几个为什么？》，分十部分：一。八二四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八二四与牛鬼蛇神，三。八二四与人民群众，四。八二四与民族关系，五。八二四与广大革命干部、党团员，六。八二四与“抓革命，促生产”、八二四与经济主义，七。八二四与夺权，八。八二四与招摇撞骗，九。八二四与人民解放军，十。八二四与毛泽东思想；共34问。

开封市各单位的造反派纷纷上街游行，高喊“我们都是八二四”，从而全市造反派名称统一为“八二四”。他们贴出标语：“自己领导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和“彻底改善党的领导，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军训无法进行。正在批判走资派、批《论修养》的活动也停了下来。

4月19日下午，几个造反派学生猛烈攻击、谩骂我，我怒不可遏，当晚写了十条《“多余的”声明》，次日贴出。除前六条外，其余如下：

“七、受八二四一小撮反动家伙蒙蔽的广大同学，是要革命的，是不自觉上了敌人的黑船而为反革命卖力的，奉劝这些同学赶快觉醒。如果硬要坚持反动立场，滑到绝路上去，甚至有人可能要‘气疯了’，说不定还会‘气死’，对于这些人，不予可怜。请记住：‘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比鸿毛还轻。’

“八、所谓蒯大富给焦守凤（焦守凤是焦裕禄的女儿）的来信，如果是假的，那只能证明阶级敌人的卑鄙伎俩。如果是真的，那也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因为第一，他的结论不符合河南实际情况；第二，信中的一些话实际上是谭立夫的反动血统论的翻版，是吓唬人的。我们是靠毛主席，靠毛泽东思想，靠广大人民群众，靠铁的事实作结论、定方针，而不是靠某一两个‘名人’的什么‘名气’作结论、定方针。

“九、我犯有很多错误，欢迎大家批评。

“十、有人站在八二四立场上经常骂我，并叫嚷要我‘滚出去’。如果是人民的需要，组织的调离，我坚决服从，我愿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如果是几个小丑骂人，我只当作耳

旁风。有人说我是‘反革命老师’。我不认为我是什么‘老师’，我是毛主席和人民群众的学生，也是广大革命同学的学生。对于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人，作他们的‘老师’，我感到羞耻。如果有人企图以‘老师’称呼来束缚我进行斗争，那只能是妄想。有人在狂喊‘揍他！’那就来吧，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这一次和二月十二日、二月十四日可就大不一样了！

“我的前八个观点，都是开封市广大人民群众一再申明过的，我仅在此表示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当前形势大好。一股反革命妖风想要阻挡历史的车轮。那就来吧，让猛烈的暴风雨赶快来吧！”

“反革命的结局，只能是人民历史对它的彻底埋葬！”

（以下是几个口号，略）

刘光耀 1967.4.20”

几个人在我这张大字报上批了许多话，给我扣了13个帽子和骂名，但没人再找我辩论了。

4月24日，针对一些人为攻击河南省军区负责人何运洪和驻豫解放军而提出的两个口号：“树立毛主席在河南的绝对威信”、“不许把河南搞成独立王国”，经过讨论我写了《大旗岂能掩盖狐尾？——揭露八二四一小撮反动家伙最近提出的两个口号的背后》。

隔不多天，八二四又有人提出“还我江山还我田”、“还我江山还我权”等口号。

师院的乌烟瘴气越来越浓，简直令人窒息。5月中旬出现了一份八二四“鏖战急战斗组”攻击五七联合兵团的不堪入目的大字报，17日我吃饭两次路过该大字报处，以极大的忍耐才把它看完，提笔在该大字报边缘写下了如下批语：

“送给《乌七八糟定情记》的作者及其后台老板：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不要脸的话，唯独破烂货的东西才做得出破烂货的事。——自我表白。

流氓阿飞一小撮，下流，下流，下流！混蛋暴徒几个人，可耻，可耻，可耻！——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人们在这张大字报上写满了批判性批语，而竟未遭到任何反击。大概八二四的大多数人也认为该大字报写得太出格了吧。

七、武斗威逼退居化肥厂

“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斗法，不仅“老保”反感，造反派中的许多人也反感，且因反感的苦恼造成精神失常。艺术系一位参加造反派的女学生，因在开封看不惯造反派的所作所为而去新疆串联，到新疆仍看不惯，回到开封又遇到更激烈的派性斗争，患了精神分裂症。数学系63级学生党树森，因看不惯本组织八二四的作为，提意见遭呵斥，精神压力受不了而患精神分裂症。

在1967年4月的两派群众大辩论高潮中，开封师院地理系65级学生、“老保”雄辩者王钦友，突然死在东城墙外的小铁路上。经法医鉴定，系钝器击打后脑勺所致。由于派性干扰，连属于自杀还是他杀，都未明确给出结论，这一人命关天的大案就不了了之搁置起来。恐怖阴

云笼罩开封上空。

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是逐步升级的。一开始是在辩论中夹杂着谩骂、吐唾沫，然后是推搡，再后是掷砖头、石块；进一步，则是操起棍棒，又发展到长矛；最后是用抢夺地方武装部和人民解放军的枪支武装起来，有些地方还动用了坦克、大炮甚至舰艇。

1967年7月13日，系里派我和63级学生李晚成、刘明书，把党树森送往新乡精神病医院。16日下午返回路过郑州，在河南农学院（今河南农业大学）碰见开封师院卫东队的几位熟人。他们说，开封发生了武斗，他们是来避难的。在郑州还看到八二四的传单，说开封“老保”在师院打死许多八二四的人，大门口血流成河。我们赶回开封后方知，几百名八二四工人于15日早晨在师院西南墙外用铁锹、棍棒围打左司的干部、工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师院“老保”闻讯，立即组织队伍，高喊“冲啊！”去抢救重伤员、抢尸体。这就是引起中央重视的开封“7.15”武斗事件。后来证实，八二四在这次事件中无一人伤亡。

17日上午，开封“老保”数千人胸戴白花游行，9辆卡车各载一口死难者的棺材。行至鼓楼街，从广播里听到又有一名重伤者在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游行途中，一位学生头头告诉我，开封火车站有师院八二四的逃难者，让我和十几位学生、教师去动员他们回校。在火车站见到4位师院教师，让他们夹在学生排成的单列队中返校。走到市公费医疗门诊部（今第四人民医院）和手持长矛的游行工人相遇。中文系一个学生高喊：“他叫黄平权，八二四的，他叔叔在台湾！”这一喊不大要紧，几名工人的拳脚飞来，有的还用长矛刺他，小腿被刺得鲜血直流，我立即阻拦。一群医护人员正在大门被关、开着小门的门口看热闹，他们见状马上关门。我急忙把黄平权拉至门口，用肩膀扛开未来得及上锁的小门，我们进去上了门。医护人员为黄包扎了伤口。

18日刚吃过晚饭，听学生说64级学生冯润生被抓回来了，在西日字院里一个大房间内。我去看他，见体育系学生正用皮鞭抽打他，就赶紧阻止。当时还见到政治系教师冯飞已被打伤，躺在地上。冯润生是八二四骨干，曾跟踪我们的长征队；4月份在北京给八二四打电话说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建立“毛泽东思想党”的正是他。我把他领到数学系办公楼上一个房间内保护起来，让学生给他端饭。冯润生很能吃苦，在东郊劳动中我们已经结下较深厚的感情。“文革”中他也从未伤害过我，对我一直很好。他是宜阳人，毕业后被分配到偃师，出任中共山化公社党委副书记，多次路过我家，并对他的同行者炫耀说：“那就是俺老师的家。”因此，村里人都知道我是冯书记的老师。

后来听说，逃难的物理系八二四学生翟贵祥在南关机械厂被“老保”打死。许多八二四学生，如数学系刘万杰等，被“老保”抓住打伤。

开封“7.15”事件发生的原因，一直是个谜。

“7.15”事件发生时，河南两派群众代表正在北京谈判。在“7.15”后的一次谈判中，八二四代表颠倒黑白，说我方打死他们多少多少人，我方代表据所掌握材料予以驳斥。7月20日前，谈判对我方有利（我方代表张本乐传达北京谈判情况时讲的）。

7月20日，武汉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大事件。“7.20”之后，河南两派在京谈判的形势急转直下。

7月25日中央表态，肯定河南二七、开封八二四为“革命造反派”。消息传来，“保守派”

（周恩来等并没有说“保守派”，而说“十大总部是群众组织”——以二七印发的资料为证）的广大群众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论？”八二四就像疯牛一样狂袭过来。成批的中学八二四学生拥进开封师院，住在师院。逃跑的师院八二四也回校了。“保守派”退缩到十号楼（它原是八二四的造反大楼），堵死侧门，只留南门，并把楼梯修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工事。

一军军训团撤离师院，换空军进入。驻信阳的6093部队到开封“支左”，杨力勇替代徐文礼任8172部队政委和开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组长。

从八二四的广播里听到“文攻武卫”口号。那是7月22日凌晨，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所肯定的。他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她告诫造反派：“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武汉的“百万雄师”被造反派称为“百匪”，开封的“左司”被称为“左匪”。

7月31日上午，在开封市人民会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双方都有伤亡。从此，除开封师院十号楼外，整个开封市区已无“老保”的据点。

7月31日下午5点钟左右，师院理发工人郭麦秀在十号楼为一些人理发，回家路过地理系教学楼时，被一群中学八二四学生毒打致死。

8月1日，我母亲来开封看我，在十号楼平台上睡了一夜。次日早，我送母亲到火车站，让她回家。

8月3日，郑州二七公社开着200来辆大卡车，满载头戴柳条帽、腰束红绸带、手持大刀红缨枪的武士，浩浩荡荡开进了开封师院。他们侦察了一下，要攻十号楼，难；就用弹弓射楼上的人，有的头、胸部被击伤。接着，离十号楼最近的九号楼顶架起了对准十号楼的机关枪。

连续几天，当驻院空军战士给十号楼被困者送饭时，都遭到八二四的堵截。战士们无奈，只好十几个人左右保护，跑步把饭车送进十号楼。

怎么办？面对如此恶劣的局势，“老保”还能在十号楼呆下去？头头们接受了“支左”首长撤离的建议。8月5日2时左右，扒开了西侧门，在空军战士的掩护下，我们悄悄地离开了十号楼。出东校门，见到左司的大部队正隐蔽在那里迎接我们。只剩下400余人的师院“老保”退到了东郊化肥厂。这时，开封市区全是八二四的，“老保”退守到东郊化肥厂、空分厂、阀门厂、仪表厂、拖电厂、联合收割机厂。东郊农村没有八二四的地盘。

到化肥厂的第二天上午，数学系学生曹万灵告诉我，有人要砸保险柜。当我们跑到的时候，一个房间的里里外外挤满了人。我竭力劝阻不让砸，说这是犯法的。可是砸的人就不听，许多人还怂恿他，说是为赴京告状凑钱。是一位年轻力壮的姓吴的外厂工人，他最终用大锤砸开了保险柜。这时我立即让大家都别动，说：“既然砸开了，咱们推举几个数钱的，每个数钱的要有三个以上的人在旁边监督。大家同意我的提议。我数了硬币。数完后，写在纸上，数钱的和监督的都签上了名字。后来，吴被判了刑。

到化肥厂第三天上午，我和数学系学生王巧娥、曹万灵走到宋门，想进城看看。宋门里外，气氛迥异。在门旁向里观望一会，他们俩说：“我们进去看看，你别进。”我看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又返回化肥厂。天快黑时，王巧娥回到化肥厂，她在师院被数学系八二四学生痛打一顿，腿上起了许多紫斑。她还听到传说：刘光耀被打死了。

在化肥厂没呆几天，师院的人都各自回家。我和一位豫西学生是步行到杏花营搭的火车。

在师院成为清一色八二四的天下时期，八二四中学生大抄离校“老保”的宿舍，还翻腾了各单位的办公室、资料室。教师们的书籍被他们拿到街上卖。我的全部书籍、资料装在一个大木箱里，放在十号楼历史系资料室，也不翼而飞。后来，许多教师又从古旧书店买回自己的书籍，他们还见到了我的书在故旧书店书架上摆放着。

要说，中央既然表态肯定了八二四，我和许多同志也都应该支持他们，可是，根据八二四一贯的恶行和愈加疯狂的暴行，怎么能让我们服气呢？我们难以理解中央的这个表态，我们怀疑中央对河南、对开封形势的判断，又怎么能够叫我们支持他们呢？我们所选择的，只能是对他们暴行的抵制。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